

论新中国语言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

韦 钰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 语言政策既是国家意志与利益的体现, 又是时代变迁、社会变化发展的缩影, 关系到政治的稳定、文化的繁荣、经济的持续以及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本文从跨学科视角, 以社会语言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为切入点, 探讨语言与社会、语言政策与经济社会的关系, 以及社会转型对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 为新中国 70 年语言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提供学理及现实依据。

关键词: 语言政策; 经济社会发展; 互动性

语言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政府为管理国家语言的使用和解决社会语言问题所制定的有关决策。无论是语言政策的内容、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心, 还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者所采取的研究视角, 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发生着新变化; 与此同时, 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政策的定位与发展问题亦直接或间接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因此, 要想较为全面、科学、系统的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与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间的关系问题, 有必要探讨二者的互动合理性依据。

一、社会转型对新中国语言政策的拉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从匮乏型传统社会向发展型现代型社会转型, 国家大力发展生产,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虽然现代化发展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得到快速提升的, 但是, 我国立国建设阶段的各项社会建设, 特别是语言文字事业等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成果, 为后续阶段的几次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贡献了巨大力量。

(一) 70 年中国社会的分阶段转型

对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的阶段划分, 有学者将其大致划分为三段: 慢速发展阶段 (1840-1949)、中速发展阶段 (1949-1978)、快速发展阶段 (1978- 今)。这是从广义的社会转型来划分的。从狭义上来看, 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制度的变迁、文化发展水平的更替等, 都可以作为社会转型的含义和划分社会转型时期的标准。本文结合学界时贤观点, 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水平为标准,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分为四个阶段: (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立国建设阶段 (1949-1965); (2) 文化发展严重受阻的“文革”异变阶段 (1966-1976); (3) 改革开放阶段 (1978-1992); (4)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1992- 今)。

在社会转型时期, 国家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政治体制改革会引发整个政治文化的变革与转型, 上到政府权力, 中到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实施各项决策工作, 下到民众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乃至价值规范、伦理道德等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 无不例外都会

发生转变。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也是如此: 政治管理上, 社会的转型促使政府的职能模式和行政模式产生相应的变化与调整, 从而影响政策导向; 文化事业上, 社会转型期的多种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变化也影响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重心与定位的嬗变。

(二) 社会转型促使我国政府职能模式的转变

1. 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全能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为了尽快从落后贫穷的农业国家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转型, 顺利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1956 年底, 随着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社会生产逐步进入了集体化时代, 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确立。这使得高度集权的完整的行政协调模式随之建立, 而建立在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的全能政府职能体系也完全形成。

1978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意义深远的伟大转折, 会议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 使我国迈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为了适应从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和发展的客观现实, 我国的政府职能也必须发生重大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心, 因此政府职能重心开始转向经济管理, 政府模式由过去的全能型政府逐渐向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型。

2. 管理体制的完善使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日渐深入,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要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法制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于是, 在社会转型的客观现实和政府行政改革的要求下, 新世纪初期, 一种全新的政府理念——服务型政府油然而生。服务型政府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政府必须在法律和人民授权的范围内, 运用现代先进的管理手段依法治国、民主决策。

概言之, 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和政治民主的发展, 都对政府权力、职责以及政策活动带来变化。改革开放以前, 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与控制基本都由国家调配, 政府宏观调控和干预经济社会的手段主要体现为统领与指令。改革开放实施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社会资源配置的形式转为市场交换, 中央权力逐渐下放, 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整也逐渐由指令性转向引导性, 过去的强制性干预手段逐渐转变为法律监管手段。有学者将现阶段的政府行政道路称为引导型道路。在这种更为科学, 且更能适应当前新社会转型时期的引导型行政模式之下, 国家各项公共政策和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会更加考虑现

实社会环境因素的多样性,以更加科学、民主和相对自由的形式有效地发展。

(三) 社会转型影响我国语言政策重心与定位的嬗变

既然社会的转型是政府职能模式转变的有力推动,那么它自然也多方面影响着国家语言政策重心与定位的转变。笔者以上文所划分的新中国四大社会转型时期为段:第一阶段:立国建设期,这个阶段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全权把控、社会结构单一以及文化水平落后等的影响,语言政策重心在于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和推广汉语拼音,使现代汉语规划化,确定标准语和标准汉字地位的基础定位。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异变期,这个阶段受当时的政治影响非常严重,政府失控、政治运动导致的社会动乱、“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的思想泛滥的影响,这一阶段语言政策没有明确定位,直到这一阶段后期才恢复立国建设期的工作重心。第三阶段:改革开放阶段和第四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所受的政治社会影响因素一样,语言政策重心和政策定位也多有重合。这两个阶段载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结构多元和文化发展多样化,再加上政府的引导和服务等,语言的政策重心也变的多元化,不仅仅在于文字改革,普及和规范化,更制定了相关文法,也提出保护濒危语言、发展双语教学,以提高国民语言能力。在定位上也提出服务、前瞻性的新定位。根据这四个阶段的描述,可以总结以下规律:

第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职能模式和语言政策重心、定位发生转变的根本制约因素;

第二,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主体,一旦失控,则会导致国家各项决策盲目进行,影响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安定;

第三,社会转型时期体现出来的各种社会环境因素越复杂多样,该时期的文化政策内容和工作重心就会越丰富多元,其政策定位的广度和高度也会逐步扩展与提高,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会更加科学与完善。

二、语言政策对社会发展变革的助力

(一) 语言政策体现动态发展的社会性特征

语言政策是国家实施的语言规范政策性原则的直接体现。由于语言规划是管理与规范语言文字使用与发展的社会性活动,因而国家的语言政策制定工作必须立足于社会语言文字的现实发展状况。这体现出语言文字工作具有社会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政治性

语言文字规划和政策的实施主体通常是国家政府及相关行政机关,因此,任何国家的语言政策都是该国政治意识和政府态度的体现,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和执行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都需要建立在充分考虑和妥善处理语言文字使用所涉及的种种政治因素的基础之上。政府的错误政治意识和态度将严重阻碍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及其他事业的健康发展,破坏社会安定与和谐。

2. 权威性

与国家各项公共政策一样,语言政策的本质是党和政府为了

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意志、有效解决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而制定的政令法规、行为准则。党中央是领导决策的核心、政府是决策执行的权力部门,因此,由中央政府领导制定和实施的各项重大政策和路线方针具有权威性,是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基本依据。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特别是建国初期的语言文字改革工作中遇到过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最终基本依靠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权威性、合理性政策措施而得到妥善解决。

3. 群众性

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群众的意愿和需要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语言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其发展必然离不开群众性基础,而语言规划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最终也要依靠群众贯彻和执行。所以,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只有尊重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才能得到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

4. 渐进性

和语言的变化发展过程一样,语言文字规划的发展要遵循语言发展的规律,顺应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循序渐进地在充分调查研究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基础上稳步进行。急于求成和突变式的变革只会导致语言文字规划工作的失败。

(二) 语言文字发展是社会变革发展的动力保障

语言与社会的各自发展遵循这样的互动规律:社会快速发展,语言文字生活就随之急速变化;社会停滞不前,语言文字的使用则守旧单一。纵观我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语言文字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语言文字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三大特点:弃古用今、弃小用大、弃繁从简。在新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始终向现代化方向逐步迈进,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促使语言文字的调整与革新,而每一次语言文字的变革,也会给社会面貌与社会发展带来新特征与新问题。社会的发展给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新要求,提供了新条件、新资源;语言共同化、汉字简化、语文信息化等语言文字规划工作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语言规划与社会发展互动相生

(一) 语言变异与语言规划相反相成

语言变异是指语言因受社会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多种差异。语言变异包括来自语言结构系统内部的语音、语义、语法变异和来自语言结构系统外部,即社会因素引起的变异。在语言变异研究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是“社会性”的变异,它包括言语社区内部由社会条件所限制的集体性语言变异和由特殊社会身份所造成的个人语言变异。由于语言文字在发展变化之中不断受到各式各样的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习俗、宗教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语言的系统性变异和社会性变异时有发生。然而,在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如果语言变异情况太多,极易造成不良交际效果,使语言文字无法很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或社会团体必须对于社会语言文字的形式

和使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科学管理与规范。

社会语言学研究表明,在人们的语言交际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趋势:一种是交际形式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另一种是交际方式的专门化和个体化。这两种特征提供了语言变异赖以发展和起作用的框架。交际形式的统一化和标准化有利于组织不同语言社团的共同生活,以促进社会统一、民族团结;而交际方式的专门化、个体化能够满足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人们发展交际或其他活动以及社会分工的需求。因此,促进某种语言变体的发展,是语言文字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语言变异的增加又为语言文字规划的完善不断提出新要求,二者相反相成。

(二) 影响语言政策的社会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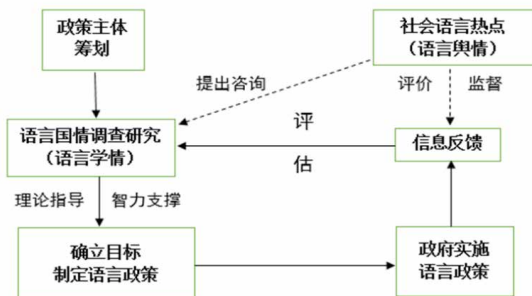
不论是共同语的选择,还是文字的规范,或是对语言文字系统本身进行改进,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提高人们社会交际的效率,维护各言语社团的团结,强化民族或国家的意识,保障社会统一。因此,在制定和实施语言政策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相关社会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影响语言政策的社会力量主要有:

1. 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态度

政府和相关政策制定机构,是语言文字规划活动的主体,其在对语言政策进行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常常会出于对一些特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采取不同的态度。这种情况在一些西方国家一般表现为,执政的政治派别不同可能造成对待同一项语言文字规划的态度不尽相同。例如,乌克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语言权利之争。国内的俄语使用者及其境外支持者谴责新的语言法违反人权,而语言政策制定者以及其西方支持者认为保障俄语使用者的权益会损害国语的地位。其国内许多人将语言选择看作是忠于两派对立政治势力、对立文化势力的象征,致使乌克兰的语言问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2. 语言学情和语言舆情的影响

语言学情是语言学界、尤其是语言规划学界通过语言文字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教学和社会科普等活动所得到的语言文字规划理论及认识。它主要表现为,语言文字应用的科研管理机构。语言舆情则是社会通过各式各样的媒体作为舆论载体所反映出来的语言态度。这是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自媒体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语言意识逐渐提升所产生的新现象。笔者结合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概念,以及其与语言学情和语言舆情之间的关系,对语言规划的过程以框图的形式进行了描绘,如下图所示:



语言规划的过程

由语言规划过程的流程图可以看出,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与语言学情、语言舆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一方面,语言政策通过政府的行政能力引导着语言学情和语言舆情;另一方面,其目标和决策内容的确立又需要得到语言学界相关调查研究的理论支撑,其在推行中还会不断接受包含社会舆论评价的反馈信息与媒体舆论监督;此外,社会语言舆情在对语言政策行使新闻监督的同时,还向语言学界提出相关问题的学术咨询。语言文字的规划正是由语言政策同社会多方面事务进行互动发展的一系列活动所构成的。

3. 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状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都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和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且常常成为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不易更改。作为一个多民族、多人口、地域广袤的国家,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复杂多样,表现在人们的语言使用中更是千姿百态。因此,对多元社会文化的国家进行语言文字管理与规划,需要考虑到各种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特征,还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新中国以来的语言文字工作始终坚持实行“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正是充分考虑到了本国特殊国情和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没有在“主体性”和“多样性”工作的处理上有所偏颇。虽然我国的语言规划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时会遇到较难处理的社会文化矛盾;但事物的发展本就是螺旋向上、缓慢向前的过程,语言政策必然要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消化成果、总结经验,循序渐进地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祖云. 发展社会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69-172.
- [2] 金太军. 政府职能树立与重构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52.
- [3] 蒋瑛. 政府职能的演进及其理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探索 [J]. 行政与法, 2009 (10): 4-7.
- [4] 周有光. 周有光文集第五卷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14.
- [5] 陈昌来主编. 应用语言学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85-187.
- [6] 徐大明等. 当代社会语言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3.
- [7] 郭熙. 中国社会语言学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136.

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发展关系研究(19BY068)”阶段成果。